

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

李 巍 王 勇

国际关系学者希望通过层次分析法,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现象分解为几个相对容易清楚界定的变量,然后通过对这些变量的取舍来构建解释国际现象的因果机制。但是,国际关系研究究竟应立足于何种分析层次,是国际关系学者探讨较多也较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探讨的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同的研究层次,为什么最终国际体系层次的理论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主流理论?为什么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出现了层次回落的新现象,即从传统的体系层次向单元层次转移?本文介绍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为建立单元理论所做的努力,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这些研究的贡献和缺陷,展望融合体系理论与单元理论的世界政治理论所面临的前景与困难。

参见 Barry Buzan,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Today* (Cambridge: Dolyty Press, 1995), pp. 198—216.

《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3期(总第7期),第112—142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体系理论的形成与第三次大辩论

直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关系研究人员还是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国内政治模型来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并以此来构建国际关系理论。这些努力包括马克思主义下的各种分支、官僚政治理论、政治精英理论、心理学方法等等。在沃尔兹(Kenneth Waltz)看来,关注个人或国家层次的原因并以此来解释国际政治事件,是还原主义的理论,其实质是通过研究个体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而从国际层次来解释国家行为的原因,则是体系理论。以霍布森(J. A. Hobson)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经济理论为例,沃尔兹对还原主义方法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揭示国际政治的行为规律,必须采用体系方法。因此,沃尔兹虽然在《人、国家与战争》中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三个层次,但后来建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时,他却完全抛开了个人与国家层次,选择了体系层次。

体系是指相同或者同类事物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以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和戴维·辛格(David Singer)为代表的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将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全面引进国际关系分析,把国际关系看做一个由诸多变量组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但科学行为主义者并未构建出真正的体系理论。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引入了国际结构概念,对古典现实主义进行了体系化的改造和加工,建立了真正的体系理论,其核心假设是体系结构决定单元互动。沃尔兹强调,我们无法适当地理解单元层次的作用,除非我们弄清楚它们赖以运行的国际体系结构;国际政治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国家按照它们的权力大小排列地位;与单元属性相比,国际结构所带来的竞争压力是决定性的。如果不同的国家处于相同的位置,其行为方式将是一样的。

为了建立体系理论,沃尔兹将国家抽象为单一、理性的行为体,只对国际体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4—25、80 页。

同上书,第 47 页。

科学行为主义体系论的代表著作,参见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 and 过程》(薄智跃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Karl Deutsch,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8)。

系进行单向反应的常量。在沃尔兹看来,无政府状态下,单元没有功能差别,只有能力差别。国内政治是由具有特定功能的不同单元构成的,而国际政治则是由重复彼此行为的同类单元构成的。沃尔兹认为,国家就像公司一样,在类似于世界市场的国际体系中理性地追逐利益;既然研究市场逻辑的经济学与研究公司行为的管理学可以分开,那么也可以类似地将国内政治抛在一边而创立一门真正的国际政治学。

沃尔兹的体系方法给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对此,有学者认为,如果说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在范式上开创了独立的国际关系学科,那么沃尔兹则通过限定它的研究边界和研究纲领进一步捍卫了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性。

新现实主义成为体系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构建。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体系理论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我们必须在解释行动本身之前要理解国际行动的环境,而且因为一个好的结构理论,比起依赖国家内在属性变化的理论,更加简约和更加经得起检验。虽然基欧汉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末设想出“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而且基欧汉始终强调要关注国家的内在属性与国际体系之间的联系,但他们最终放弃了将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纳入“复合相互依赖”模式的设想。随后,基欧汉进一步放弃了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挑战,进而承认国家是国际体系中最有分析意义的行为体,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并接受新现实主义对国家性质一元、自主和理性的三大核心假定,从而实现了两大理论范式的合流。在承认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29、139页。

Stefano Gu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126

罗伯特·基欧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理论》,载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7页。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基欧汉和奈试图将国内政治纳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中来的努力,最明显的体现是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基欧汉和奈质疑了现实主义有关国家是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理论假定,但后来基欧汉在这一点上又逐渐向现实主义靠拢。参见 David A. Baldwin, “Neoliberalism, Neore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8—9。

权力结构的基础上,基欧汉引入国际制度变量,认为国际制度通过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和防止欺骗,对国家的行为构成约束,从而构建起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大厦。显然,新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是一种高度简约的体系理论,看不到单元层次的变量起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并没有颠覆新现实主义,而是其重要的补充,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借鉴了新现实主义的重要成果。甚至基欧汉本人也对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个标签不满,认为自由制度主义“从现实主义中汲取的东西跟从自由主义中获取的一样多”。

这样,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大辩论的主要论战方——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和以基欧汉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分别创建了各自的体系理论。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发展了主流建构主义,把沃尔兹的国际权力结构变成了国际观念结构,将物质体系变成了观念体系,但支持新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一元行为体的假定,进一步强化了国际关系理论以体系理论为主流的特征。

体系理论的主要特征是,假定行为体内在属性既定,使其成为常量;解释行为体的行为变化和体系产生的结果,立足于体系属性上的变化,而非行为体特征的变化。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主流建构主义都忽略了国内层次的次国家行为体,加剧了国内政治退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倾向。理论因此变得更为简洁,更富有美感,在科学性和严谨性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其他代表作品请参见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Kenneth A. Oye, ed.,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Arthur A. Stein,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Robert Keohane,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the Realist Challenge After the Cold War,”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pp. 269—300.

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

秦亚青教授曾对国际关系的三种体系理论进行过探讨,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

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53页。

二、分析层次的回落及其原因

体系理论有关国家的假定抽象掉了单元属性的多样性,忽略了影响国际关系的关键方面——国内政治,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过于简化,丢掉了经典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丰富与复杂的内涵,限制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现实的理解。正如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所说:“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紧紧交织在一起,国内政治一直被理解为支撑国际政治的背景,且前者经常是后者的根源。”他批评道,体系理论“排他性地关注全球国家体系是怎样制约个体国家行为的”,因而“内部与外部力量的复杂互动关系大多未被考察”。

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意味着国际关系现实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同时,研究人员已经不满足于沃尔兹所说的只能解释“少量”而“重大”的国际现象的理论,希望在简洁的体系理论基础上构建能够解释更多现象的理论。因此,体系理论对国家所做的一元、自主和理性的假定,便成为其他范式的首要攻击对象。放宽体系理论关于国家的假定,复兴从国内政治视角解释国际关系的方法,使其如体系理论一样简约并高度理论化,进而与体系理论进行因果逻辑链条上的整合,便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这种现象可称为国际关系研究分析层次的回落。而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要求。

(一) 现实变化的需求

最近一二十年,由于高度紧张的冷战结构崩溃,以相互依赖为特征的全球化进程逐步加快,民主化浪潮兴起,使得当今世界不再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更多层次、更多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难以泾

James N. Rosenau and Mary Durfee: *Thinking Theory Thoroughly: Coherent Approaches to an Incoherent Worl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p. 4.

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胡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0页。

同上书,第 26页。

肯尼思·沃尔兹:《反思 国际政治理论——对我的批评的答复》,载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 301页。

渭分明,罗斯诺 (James Rosenau)将这种状态称为“后国际政治”时代。现实的变化促使人们重新重视国内因素的影响。

第一,冷战后来自国际结构的安全压力全面缓解。正如沃尔兹所言,并非在所有情况下,体系因素都处于决定性地位,因为“在不同的体系中,单元层次和系统层次因素所起作用的比重”是很不同的。在结构压力巨大、国家安全和生存问题急迫的体系中,体系层次因素的作用自然居于首位;而在结构压力松弛、国际经济和社会福利成为关注重点的体系中,单元层次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弱国际结构的作用。冷战期间大国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安全压力,而冷战结束后,大国体系中安全结构压力明显松弛,国内因素的影响随之上升。

第二,新一波民主化浪潮释放了国内行为体所蕴藏的巨大政治力量。冷战结束、民主化浪潮兴起,释放了先前被国际结构所压抑的国内政治力量,国内行为体在影响国际关系时表现更加活跃。众多民主国家的出现给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提供了新的渠道。

第三,全球化加速使国际与国内的界限日益模糊。全球化现象体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核心观点: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不能分裂。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与国内利益的分配紧密相关,这刺激了国内行为体竞相影响国家应对全球化的政策;同时,全球化浪潮促使全球市民社会和跨国行为体的兴起,主权国家的传统权威正在逐渐消退或退却,非国家行为体开始构成对主权国家体系的实质性冲击。

所以,体系理论将国内政治和跨国政治抛弃在理论研究之外的做法越来越远离现实。即使不考虑上述现实变化的原因,体系理论对国际政治历史现实的理论解释也存在着先天缺陷。体系层次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冷战为什么爆

James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34、65页。

Peter J. Katzenstein, et 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3, 1998, p. 670.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发,冷战期间为什么能够保持持久和平,但不能很好地解释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功能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其国际行为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冷战在不同阶段的激烈程度不同,更不能解释冷战为什么突然和平地终结。正如约瑟夫·奈所说的那样,“只有考察国内政治,才能真正理解冷战”,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和东欧的国内政治运动改变了国际关系的结构。因此,两极权力结构的解体只能从单元层次而不是体系层次寻找原因。

冷战的终结促使学者们全面反思体系理论过度简化国家单元层次的变量的缺陷。体系理论对单元层次属性的高度简化,虽然使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构建达到相当精致的程度,但其对现实的解释也开始出现偏差,逐渐超出了现实所允许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检查原有理论的假定,需要单元理论校正体系理论出现的偏差,因为理论不能仅仅建立在完全的思维基础上,而应建立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以及经验历史的研究之上,实践、经验和历史才是概念和假定的实验场所。

(二) 理论进步的需求

在阐述科学理论的发展规律时,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写道,尽管只是为了思维上的方便,但“学术上的惯例是,将紧密联系着的现实世界分割成多个相互分离的领域,每个领域拥有自己的理论;这是提高理解力的一个必要和现实的办法”。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遵循不同的逻辑,国际层面的行为和制度形式与国内层面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两个

用结构现实主义观点来解释冷战发生和持久和平的代表性著作可参见 John L.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苏长和、信强:《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评介》,载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 11 页。

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3 页。

罗伯特·考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载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 189 页。

同上书,第 187 页。

截然不同的学科相互独立,自然有其合理性。在体系论者看来,世界可以分成很多自主的政治单元,这些政治单元是一个个黑匣子,国际关系是研究体系层次的力量以何种法则塑造和约束这些黑匣子的运动。至于黑匣子里面的东西,则是政治学另一分支——比较政治学所研究的范畴。

根据简约原则,理论应该从最基本的原因着手分析,看看它们有多大的解释力,然后再根据需要,分析较为复杂的原因。对于国际关系这个很不成熟的学科而言,在构建理论时可能需要对现实进行大胆假定,并限制理论的解释范围。只有当宣称在某个既定范围内有效的理论经受逻辑和经验的检验之后,我们才能逐步放宽原先的假定,进行新的理论推演。从这个意义上说,着眼于体系层次,构建简约的体系理论是建设国际关系理论所必需的。沃尔兹在回应其他学者对其忽略国内政治的指责时说:“有朝一日,人们也许能找出一种方法,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融合进一个理论;但在这之前,国际政治的学者们可以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分开研究,并有所作为。”显然,在沃尔兹眼中,国际结构的力量显而易见,抛开国内政治确实给国际关系理论家带来了极大的思维方便。

但是,我们必须对这种理论简化保持高度的警惕。简约不是判断理论好坏的唯一标准,尽管单元理论很可能会破坏体系理论的简约,但如果世界本身就不简单,简化的思维方式就无助于人们理解力的提高。研究者需要“知道什么地方被简化了,并意识到简化可能导致他的预测脱离可观察到的事实”。简约的体系理论也许是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起点,但体系理论只能提供一种粗略的答案,单靠体系层次的分析尚不能对国际关系现实做出解释力更强和适用范围更广的理论解释。如同其他理论一样,体系理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包罗万

Helen V. Milner, "Rationalizing Politics: The Emerging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 America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3, 1998, p. 759.

Ibid., p. 104.

肯尼思·沃尔兹:《反思 国际政治理论 ——对我的批评的答复》,第 298、311 页。

其实,沃尔兹也曾写过一本有关对外政策的著作,详细研究了国家内部结构的差异对美国 and 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参见 Kenneth N. Waltz,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MA: Little Brown, 1967)。

Joseph S.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41, No 2, 1988, p. 243.

布鲁斯·拉西特、哈韦·斯塔塔尔:《世界政治》(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2 页。

象。体系理论为了集中研究某些事情而忽略了另外一些内容,对于那些被忽略的东西,人们仍陷于“无知的山谷里”。因此,不少国际关系学者把注意力转向体系内部的单元,考察单元内部发生的事情,增加分析的复杂性,这表明将分析层次从体系层次降到单元层次成为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

虽然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没有将国内政治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但都没有否认国内政治的重要性,因为国家在面对国际体系所提供的机遇和制约时,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沃尔兹承认,“如果许多不同种类的单元层次的变化,不会引起体系结果的变化,我也会感到不可思议”,对此他甚至认为,“任何国际政治都同时需要一种国内政治的理论,因为即使当一种体系的结构影响国家时,国家也在影响这种体系……正如市场理论也需要公司理论一样”。但沃尔兹强调,问题不在于他忽略了什么力量,而在于从什么层次上可以观察到这些力量在起作用。基欧汉也强调:“我们需要更好的国内政治理论……有了这些理论,我们就可以系统地架起一座桥梁,填平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之间的沟壑……也就是说,我们更需要关注……‘内外互动’。”

随着推动理论进步的需要,无论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单元层次的研究都得以复兴。而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分支,更产生了一些超越传统体系研究方法,将国际国内层次连接起来的颇具特色的理论成果。

三、现实主义:从国际结构到国内根源

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争论中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就是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论,这些争论产生了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及新古典现

布鲁斯·拉西特、哈韦·斯塔尔:《世界政治》(王玉珍等译),第298、302—303页。

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77页。

Joseph M. Grieco,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Limits for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Realism Theory,”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p. 330

现实主义等多个现实主义的变体。其中,进攻性现实主义继续强化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假定,包括国家是单一、自主、理性的行为体,国家“犹如台球,只是型号不同而已”。而另外两个分支,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则都试图从单元内层次(即国家内部)来考察国际行为规律的根源。

(一) 防御性现实主义

虽然现实主义内部确实存在着将国家间关系区别于国内政治的传统,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同质性的假定始终面临着其他理论的挑战。许多学者认为,国际冲突源于国家内部,代表人物包括森、凡勃伦(Veblen)、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和一些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家从这些学者的著作中汲取营养,从国内因素入手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

在现实主义传统下,斯奈德借助国内因素提出了解释国家对外过度扩张的新理论。通过考察英国(1830—1890)、德国(1866—1945)、日本(1868—1945)、俄国(苏联)(1845—1989)和美国(1945—1989)对外扩张的历史,他发现,帝国过度扩张源于国内利益集团挟持政府实现自身利益,是穷兵黩武的总参谋部人员、战略性的神话制造者、帝国主义的卡特尔导致国家走上了过度扩张的道路。这些利益集团说服国家决策者并使人民相信,只有通过扩张才能获得安全,从而构成帝国扩张的主要动力,而这些利益集团则从军事动员或者经

这些新标签是否会被学术界广泛接受,还有待观察。参与现实主义内部争论的各个派别显得比较混乱,观点也并非都很清晰。同时,不同学者对它们进行分类的标准不同,因此这些分类之间存在相互重叠的部分。有中国学者对冷战后现实主义内部争论进行了详细分类,具体参见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最能体现现实主义内部争论的文集参见 Michael E. Brown et al.,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5);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London: Frank Cass, 1996)。中国学者对现实主义内部争论的探讨可参见于铁军:《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5期;唐小松:《论现实主义的发展及其命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17页。

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认为还存在着结构防御性现实主义,比如沃尔兹;也存在着新古典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比如施韦勒。对于这种一家之说,笔者不予讨论,而取最主流的看法。但是,笔者依然感谢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博士研究生刘丰提醒我们注意这个问题。

对这派学者观点最为清晰的阐述,参见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80—159。

济管理中实现了集团或部门利益。在斯奈德看来,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出现在国家工业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

此外,斯奈德还根据其理论预测,由于缺乏制度化形式,冷战后走向民主化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难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意愿,因此,这些国家存在着政府为少数利益集团利用的危险。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些集团可能奉行更具进攻性的政策,尽管这种政策可能会伤害社会中大部分人的利益。

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则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国家偏好和对权力的感知上,而非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在他看来,国家对权力的感知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自利的官僚、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些偏好和社会利益集团的相对权力决定着国家对权力的感知。范埃弗拉还把国家的行为与国内多元利益集团的偏好和权力联系在一起,认为强大的利益集团联合起来,通过误导和胁迫弱小集团发动战争来获取自身狭隘的利益。在此基础上,范埃弗拉分析了欧洲国家国内情况的变化,发现欧洲国家中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衰微、民主逐步扩展、社会分化程度下降、革命精英统治的国家消失。因此,他认为,冷战后的欧洲已经为“和平作好了准备”,反驳了米尔斯海默关于冷战后欧洲必将重新陷入混乱的悲观论调。

概括而言,防御性现实主义主张,应把相关的国内因素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之中,以改进新现实主义。但是,如何在保持现实主义传统的前提下,融合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理论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防御现实主义面临着根本的困难。斯奈德等完全依靠国内因素做出解释的理论,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Jack Snyder, "Averting Anarchy in the New Europe," i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3), pp. 105—106.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10.

Stephen Van Evera, "Primed for Pe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pp. 193—195.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1990, pp. 5—56.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 463.

比如,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认为:“当新现实主义随意将国内政治排除在外的時候,许多防御性现实主义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向,试图在他们的理论中用国内政治来包办一切。但这最终不能提供一个很好的与体系影响相一致的国内政治解释模式,因为理论上的雄心勃勃破坏了其固有的真知灼见。”以扎卡里亚为代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单元层次分析法对新现实主义矫枉过正,所以应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进行重新纠偏。

(二) 新古典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力图复兴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将国内政治重新带回国际体系的分析中,将“第二意象”(国内结构)和“第三意象”(国际体系结构)结合起来,以此来探讨国家的国际行为,试图找到解决体系层次分析和单元层次分析相分离的方法。

新古典现实主义承认,国际体系力量分布是国际政治和各国对外政策的首要决定因素,同时重视单元层次的分析,把政府力量作为中介变量纳入自己的分析框架,认为体系层次的变量要通过单元层次的变量起作用,不研究单元属性将无法理解体系后果,因为即便国家具有相同的总体实力,但由于国家的内部结构不同,很可能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

例如,扎卡里亚发现,19世纪下半叶,美国逐步跻身工业强国之列并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仍不愿卷入国际事务。对此,新现实主义理论无法解释,而其提出的政府中心现实主义将国内变量即政府的力量引入到体系理论之中对这一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扎卡里亚认为,外交政策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制定的,而是政府制定的;因此,重要的是政府力量而不是国家力量,政府结构会影响到国家力量的发挥。政府如同撞球的弹子,每个弹子都由不同材料制成,这影响了它在国际平面上的速度、旋转和反弹。政府的结构、范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p.463;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8), p. 28.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 147.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p. 5.

围和能力是解释国家对外行为的关键因素。政府越强大,其利用国家实力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就越大。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扩张主义的历史支持了扎卡里亚的理论假设。内战结束后数十年内,美国国家实力迅速增长,但政府权力分散,国会和州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行为能力构成了强有力的制约。政府过于虚弱,不能持续集中资源来完成目标,不能以连贯一致的方式行动,将美国真实的力量遮掩起来,使美国几乎无力扩张。直到麦金莱时期,权力从各州转移到联邦政府,从立法部门转移到行政部门,政府的力量得到加强,美国才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另一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也指出,单从权力分配入手并不能很好地说明国际政治,尤其不能解释国家究竟会采取制衡还是追随强者的政策。若要寻找原因,要考察国家目标,即是现状国家还是修正主义国家。施韦勒同样强调外交政策不是单纯由国家权力决定的,而是由政府能力决定的。政府能力取决于政府领导人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调控能力,国家的内部结构制约导致国家权力的有限性。

20世纪 90年代,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分别将国内政治纳入到国际关系的研究框架中,要求打开国家黑匣子来研究国家内部的结构,但这种努力却遭到了自由主义者的质疑。自由主义认为,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寻找国家对外行为特征的因果机制,无疑走上了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的逻辑推理中;与其说这些现实主义者是在挑战新现实主义,倒不如说是在将现实主义变成了自由主义。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pp. 35—43.

Ibid., pp. 10—12, 185—186.

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pp. 249—286.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18—221.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1999, p. 34.

四、自由主义：从国际制度到国内偏好

相对于现实主义而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理论群。迈克尔·多伊尔 (Michael Doyle) 宣称：“不存在对自由主义的权威界定。”阿瑟·斯坦 (Arthur Stein) 也认为：“自由主义的核心要素仍处在争论之中。”自由主义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理论分支，包括商业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

除了制度自由主义外，其余三支自由主义理论都反对体系理论关于国家是单一理性行为体的假定。自由主义强调，国家与国内和跨国社会的关系，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的偏好，从而塑造了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行为。基于社会偏好和国家行为关系的核心假设，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拥有不同利益取向社会行为体的代表机构，发挥着传送带的作用，将个体和集团的偏好和权力转化为国家政策。因此，国家的性质以及社会利益集团才是国家国际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国家

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1, No 1, 1986, p. 1152

Arthur Stein,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

关于自由主义的内部理论流派可参见 Joseph S.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p. 248;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Liberalism Reconsidered," in John Dunn, ed., *Economic Limits to Modern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65—194; 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4, 1997, p. 515; 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 Divergent Strands," in Charles W. Kegley, ed., *Controvers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ism Challeng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21.

也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还有一个分支，即军事自由主义。其核心假设是，现代战争高额的成本使得战争成为一种过时的工具，其代表作是 John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对军事自由主义的详细分析，参见 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 Divergent Strands," in Charles W. Kegley, ed., *Controvers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126—129.

有的学者将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看做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流派，参见 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p. 513。但也有学者将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完全等同起来，参见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1995, pp. 5—49。本文认为，制度主义来源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但利用现实主义方法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改造。

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p. 518

行为的改变源于国家本身偏好的改变,而不是国际环境的改变。例如,国家对国际制度的偏好或认同就源于国内结构,不同的国内结构会导致国家对国际制度和国际合作的不同态度。

(一) 共和自由主义

共和自由主义探讨国家制度与国家对外行为的关系,提出了“民主和平论”,其核心理论假说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将是没有战争的世界。民主之所以能带来和平,原因有三:第一,民主国家的人民反对战争,因为人民总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会支持企图发动战争的政党和领导人;第二,民主国家开放透明的政治体制使国家间的信息传递畅通无阻,有利于国家间准确了解彼此意图,消除误解;第三,长期的民主文化使国家倾向于协商与谈判,而不以战争与胁迫来处理国际纠纷。因此,民主政体改变了国家的对外目标偏好,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

民主和平论直接触及了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究竟应该从“第二意象”还是“第三意象”来解释国际结果。与体系理论相反,民主和平论以国内政治为基础解释国家对外行为,成为将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联系起来的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民主和平论的理论价值在于批驳了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功能相似的假定,认为国家的制度差异,即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导致了不同的国际后果。

(二) 商业自由主义

现实主义、依附论、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对国际贸易、经济相互依赖与

民主和平论的代表作可参见 Michael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December 1986), pp. 1151—1169; Michael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2, No. 3/4, pp. 205—235, pp. 323—353; Bruce Russett, *Grappl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Avon Books, 1992)。

Christopher Layne, "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Democratic Peace," 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 287.

战争、和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是,现实主义、依附论和新自由主义使用的是体系分析方法,只有自由主义通过考察单元层次偏好建立了“贸易和平论”。

20世纪80年代末,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系统地提出了贸易国家的思想。在罗斯克兰斯看来,历史上的国家是领土国家,迷恋领土,因为领土是生产和权力的关键因素,这决定了国家要提高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唯一的办法就是侵略其他国家,掠夺领土。因此,国际体系总是充满冲突与战争。领土国家的代表是19世纪的英国和俄国。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完成,发达国家逐渐发现,领土在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中的价值越来越低,资本和技术才是经济竞争的关键,而国家要通过贸易(而不是战争)获得资本和技术。于是国家的偏好发生了变化,由占领领土变成发展贸易,国家领导层也由倾向于和平的商业精英取代了好战的军事精英,领土国家变成了贸易国家,其代表是20世纪下半期的德国和日本,而贸易国家的兴起导致国际冲突的减少。

十多年后,罗斯克兰斯观察到国家行为体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建立在知识创新和信息占有基础上的虚拟国家。这些国家将生产线外包到其他国家,而专注于为世界市场提供知识和服务,包括荷兰、丹麦、芬兰、新加坡等。罗斯克兰斯认为,在一个由领土国家组成的体系中,跨国流动的是士兵;在一个由贸易国家组成的体系中,跨国流动的是商品;而在一个由虚拟国家组成的体系中,跨国流动的是信息。前者带来战争,后二者带来和平。因为贸易国家和虚拟国家兴起使战争的收益减少而成本增大。

从领土国家到贸易国家再到虚拟国家,罗斯克兰斯关注的是构成体系的单元而不是体系本身,而作为单元的国家在功能上是有差别的。不同功能类型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对外偏好,进而产生了不同的国际后果。因此,国际体系的性

现实主义代表作参见 Albert O.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Edward D. Mansfield, *Power Trade, an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作,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 1986)。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Virtual State: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Coming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 1999)。

质和状态源于单元的性质和状态,单元属性的改变导致国际体系性质的变化。简言之,单元是体系的诱因,而不是相反。

(三) 社会自由主义

社会自由主义也称观念自由主义或认知自由主义,强调国内社会的认同和价值是决定国家偏好的根本因素,是国际体系冲突与合作的根源。可以说,社会自由主义是理性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中间地带,它试图在观念和理性决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提出了交流和平论。

该理论认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能改变国内社会的整体认同,从而构建国家之间的和平。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是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学者。这些学者认为,民间的跨国交流有利于建立起支持一体化合作的国际网络,从而改变传统的国际权力体系;国际合作取决于认知共同体的形成,而认知共同体最终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政治精英和跨国组织超越国界的互动。

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观察到一种新现象——世界政治中的许多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它们与国家及国际组织之间发生着互动关系,形成了能够影响国际关系决策议程的跨国网络,而这些跨国网络的形成主要是以共同的道德理念或价值观为核心的。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E. Keck)和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将其称为跨国倡议网络。在她们的研究中,倡议网络的行为体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的非政府研究机构和倡议组织;地方社会运动;基金会;媒体;教会、商会、消费者组织和知识分子等。她们认为,倡议网络是解释世界政治变化原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倡议网络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上述行为

代表作和代表人物分别参见: Joseph S. Nye,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Boston, MA: Little, Brown, 1971); Karl W. Deutsch,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7)。

Peter Haa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1, 1992; Enst Haas, *When Knowledge is Powe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8—10。

Margaret E. Keck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体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话语体系,它们之间的核心内容是信息交流。倡议网络通过游说、宣传、教育和演讲等非权力方式,影响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等国际关系中强大行为体的立场和政策调整,它们的活动方式使国家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导致国家主权关系实践的转变。不难发现,交流和评论者将国内和跨国的社会力量视为影响国家对外行为乃至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变量,主张形成跨国网络的跨国行为体应该成为主要的研究单位。

综上所述,虽然共和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商业自由主义的核心变量并不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强调国家属性和社会构成影响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偏好和目标。在自由主义范式下,国家偏好(而不是国际制度)成了解释国际关系的核心变量,而要研究国家偏好就必须将国家的黑匣子彻底打开。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自由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体系理论构成了重大挑战。

五、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国内的互动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范式已知缺陷做出的反应”,并将现实主义者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使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从传统的高级政治转向低级政治,并且模糊了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界限,即便那些依然坚持国家中心研究路径的学者也仅仅是为了理论的方便而不是基于现实考虑。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与发展贯穿着两条清晰的研究路径,一是研究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与市场关系,并催生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主义范式;二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与国内政治经济的互动。

基于第一条研究路径,以吉尔平(Robert Gilpin)和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强调,国家在世界市场中具有自主性,市场没有削弱国家的力量。通过对美国跨国公司的分析,吉尔平发现自由主义的主权

George T. Crane and Abba Amawi, ed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Rea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

Peter J. Katzenstein et 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p. 663—664.

困境模式具有误导性,国家利益仍是主权国家考虑的首要因素,民族国家相对于跨国公司仍具有足够的权力,国家在世界市场中仍具有中心地位。克拉斯纳则通过研究 20 世纪美国在原材料领域的对外投资行为,发现国家是一个类似于经济人的自主实体,天然地根据成本—收益原理,理性地在国际体系中追求国家利益。

国家主义范式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认同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理性和自主的假定,彻底忽略行为体内部的决策程序和国内行为体的施动作用,力图在国际层次上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构建简约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迁理论。但是,国家主义不是体系理论。体系理论强调体系层次的结构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决定作用,而国家主义正好反过来,强调国家在世界市场中自主地追求国家整体利益的行为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而且,与体系理论相反,国家主义强调各个国家的利益是不同的,即便它们处于相同的权力地位。不过,国家主义的中心任务不是分析单元内部的结构,并不试图去打开国家黑匣子,而是将国家当作一个抽象行为体,分析其在世界市场中的逐利行为。所以,深受现实主义影响的国家主义范式虽然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从体系拉回到国家,但它们没有创造一个很好地囊括国内政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以国内政治经济结构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互动为轴线,努力把世界经济和国内利益联系起来,寻找简约的方式解释对外政策。在这条轴线下,又可以分为两条研究线索,一条是研究国际结构对国内结构的影响,可谓由外到里;另一条是研究国内结构对国际结构的影响,可谓由里到外。由于由里到外的线索一般经过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这一环节,故可以把这一线索简化为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最

Robert Gilpin, *U. 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5).

Steven D.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在其新作中,吉尔平将自己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和沃尔兹以体系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作了区分。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 页。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更为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条路径,最早介绍到中国的吉尔平、克拉斯纳和斯特兰奇的理论都是根据这条路径建立起来的。相反,我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二条路径关注还不多,很多著作都没有介绍进来,这可能是第一条路径简约因而更容易接受。

初从事这项工作并作出重要贡献的是一些比较政治学家,他们活跃在国际政治经济与国内政治经济的交叉地带,成为最早将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新天地。

(一) 从国际到国内的研究线索

遵循这条线索,西方学者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了系统的研究。1978 年,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发表论文,改造了沃尔兹分析国际关系的三种意象的概念,提出了“颠倒的第二意象”,强调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在他看来,有两种体系层次的力量在塑造单元层次的结构,一是国际权力结构,即国际政治体系的权力分布状态,二是国际市场结构,即国际经济体系的财富分配状态。简单地说,国家间的战争与贸易深刻地影响着国内政治的发展。

根据“颠倒的第二意象”,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i)成功扩展了经济学中的斯托尔普珀—萨缪尔森(Sto per-Samuelson)模型,提出了国际贸易的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他认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强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如果多于其他国家,它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该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因此,它们会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掌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罗戈夫斯基以非常简约的理论模型和分析结构探讨了国际体系层面因素——国际贸易——的变化如何促成了国内政治结构的变化,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依据“从外到里”研究线索,分析国际政治经济与国内政治经济互动而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两极结构的瓦解,全球化浪潮空前加剧,国际力量介入并影响国内政治的势头更加明显,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迁都深深地打上了国际痕迹,这些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密切关注。1995 年,里斯—卡彭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1978, pp. 881—912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Thomas Risse-Kappen)主编了《把跨国关系找回来》一书,考察了跨国性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利益集团对国内结构变迁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跨国行为体和跨国联盟通过两个中间变量影响国家政策,第一个是国内结构,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内结构决定了跨国行为体参与政治系统并且组建获胜联盟来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第二个是国际制度,即某一问题领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双边协议、多边机制以及国际组织的约束而影响跨国行为体行动的空间。因此,国际制度和国内结构的互动决定了跨国行为体改变政策的能力。

一年后,基欧汉与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主编了《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该文集通过对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国际贸易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所形成的跨国经济力量,发现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与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以及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该文集的核心主张是,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变化,我们就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这些研究成果为研究国际力量如何塑造国内结构作出了新的贡献。

(二) 从国内到国际的研究线索

遵循第二条线索,一些学者从国内政治制度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探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发展了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他们根据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国家划分为强国家和弱国家。强国家是指国家相对于社会做出决策的自主性较强,而弱国家意味着国家的决策更多地受利益集团和阶级的支配和影响,因此分析强国家容易进入国家主义范式,分析弱国家则容易进入社会联盟范式。这种分类暗示,分析不同性质的国家应使用不同的方法,从而否定了体系理论对单元同质性的假定。

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bert Keohane and Helen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eter B. Evans et a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5).

早在 1976 年,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就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地位至少同等重要,不同国内结构的制约导致国家在面对相同外部压力或外部机遇时产生不同的外部行为。不久后,卡赞斯坦主编了《在权力与财富之间》一书,分析了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时,美、英、法、德、日、意六国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导致了不同的对外经济政策,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研究国家对外经济政策提供了与体系分析和国家主义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

20 世纪 80 年代初,约翰·鲁杰(John Ruggie)认为二战后所形成的“内嵌式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受到自由市场侵蚀的社会性力量对 19 世纪放任自由的经济秩序的反弹,是全球市场对国内社会的一种妥协。在鲁杰看来,被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国内社会力量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重要变量。鲁杰的研究直接促成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倾向,即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用以社会为主导的视角来取代以国家为中心的范式。

1986 年,提出“颠倒的第二意象”的古勒维奇根据“正立的第二意象”出版了《艰难时世中的政治》一书,从国内社会利益集团的政治运作来探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从而构建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社会联盟理论的大厦。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 Frieden)以美国为案例,批评体系理论和国家主义范式假定民族国家为理性、一元行为体削弱了其解释国家对外行为的有效性,并检验了社会联盟理论。弗里登认为,体系理论和国家主义范式都无法解释为何一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成为世界第一,其对外经济政策却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

Peter Katzen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0, No 1, 1976; Peter Katzenste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 and Strategi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1, No 4, 1977.

Peter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7).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95—231.

Peter G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之间徘徊。他研究后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而后者要求国内利益优先,坚持孤立主义。弗里登认为,美国国内社会利益集团的冲突与合作对国际关系学界解释国际经济的对抗与合作具有关键意义。

不过,比较政治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认为,单从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运作或者国际体系的结构压力来理解国家的对外经济行为都是不够的。在国际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谈判。因此,国际经济后果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双层博弈的结果。在双层博弈论者看来,国际关系的行为体不是国家,决策者、立法机关、国内集团和政治联盟才是国际关系的施动者,它们构成了国际关系最有研究价值的微观基础。双层博弈的分析方法批评体系理论缺乏微观的分析基础,为此它抛弃了国家是施动者的假定,强调体系分析法所抽象出来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国内冲突和斗争的产物。

此后,彼得·埃文斯(Peter B. Evans)、帕特南等主编的《双面外交:国际谈判和国内政治》,将双层博弈的思想系统化,并进行了大量的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双层博弈既存在于经济领域,也存在于安全领域。双层博弈既克服了体系理论对国内层面的微观基础视而不见的缺陷,也克服了单纯从国内层面解释对外政策而忽略国家决策的体系背景的问题,是连接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出色理论成果。

1997年,构建双重博弈理论的重要参与者——米尔纳出版了《利益、制度和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一书,对新现实主义关于国家一元性的假定提出了最为系统的批判。她认为,国际合作是否成功不取决于现实主义所说的相

Jeffrey Friden, "Sectoral Conflict and U. 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14—194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1, 1988, pp. 60—90.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1988, pp. 427—460.

Peter B.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对收益问题和欺骗问题,而取决于国内的分配结果。受理性选择理论的启发,她在国内层次找到了决定国家对外行为的三个关键变量: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分享权力的制度安排和信息的分配。

米尔纳从国内政治的视角分析了国际合作问题,从而提出了与现实主义的联盟和均势理论及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合作论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米尔纳认为,沃尔兹关于“国际体系无政府,国内体系有等级”的假定并不成立,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都处于无政府与等级体系之间的中间地带,是各种政治实体相互竞争的状态(即多头政治)。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权力分配的制度特点和它们之间的信息分配决定了国家趋近于无政府状态还是等级状态。如果不同国内行为体的政策偏好越趋向于一致,决策权力越集中,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信息分配越失衡,那么该国就越趋近于等级状态的国家;反之,政策偏好越多元,决策权力越分散,信息分配越平均,该国则越趋近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只有高度等级状态的国家才符合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一元行为体的假定,才存在单一的国家利益,而越是接近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新现实主义的假定就越不成立。

既然国家不是一元行为体,那么国内政治的作用就不能被忽略。在米尔纳看来,国际合作在国内创造了受益者和受损者,因此分别产生了对国际合作的支持和反对力量。这些国内集团的斗争塑造了国际合作的性质和可能性。所以,米尔纳认为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都受到国内考虑的影响,“国际合作是国内政治斗争以另外一种方式的继续”。

总之,受经济学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直致力于寻找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变迁的微观基础。在全球市场中,除了国家之外,许多跨国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是天然的活动者,它们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单元更加多元化,不仅彻底放弃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范式,而

2005年11月,米尔纳教授在参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的一个小型座谈会时,回答了笔者关于如何理论化国内层面变量的问题。她主张借助理性选择的分析工具。但是,她所指的理性选择方法与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方法不同。米尔纳的理性选择是国内行为体的理性选择,表现在国家对外政策上未必就是理性的,而基欧汉则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假定国家是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互动的。

Helen V. Milner, *Interest,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且试图打通长期分离的国际与国内研究的界限,以便在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之间构架一座桥梁。创建一种囊括国际和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全球政治经济学成为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向。国际政治经济学最早也最成功地将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探讨,成为近二十年来国际关系学最富有活力和生机的领域之一。

六、世界政治理论的生成

最近十多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出现了研究层次从体系向单元回落的现象。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国家并非像一个黑匣子那样,仅仅遵循权力结构、国际制度和观念结构的逻辑在运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次的回落,既意味着将国家本身也当作一个体系,把分析的视角深入到国家内部;也意味着承认国家不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唯一甚至首要的单元,跨国行为体也应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价值的单元。因此,这些学者更愿意用世界政治理论来取代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政治理论)。

(一) 国际政治理论、外交政策理论和世界政治理论

沃尔兹之所以对体系方法坚信不疑,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他认为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存在重大区别。在他看来,国际政治研究的是由国家行为和互动产生的国际结果,从而告诉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压力;对外政策则研究国家的特定行为,回答国家如何应对外部压力。沃尔兹认为,两者的差异使它们应该遵循不同的理论建构路径。

但笔者认为,绝对区分国际政治理论和对外政策理论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首先,如果国际政治研究的是国际互动的结果,而国际互动的结果本身就

就连宣称自己是国家主义者的吉尔平在其 2001 年的著作里也开始承认以前对国内因素强调不够,书名使用《全球政治经济学》,而不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

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导读》,载于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姜鹏、董素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页。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 95—96 页。

是国家,特别是大国行为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剔除国家,特别是大国的政策行为,又如何能够理解国际结果,并理解国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压力呢?其次,如果对外政策要研究国家的特定行为,那么不理解国际环境和既有的互动结果,又如何理解国家外交行为的外部制约因素呢?所以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根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离开外交政策的国际政治研究,也没有离开国际政治的外交政策研究,非要区分它们只会人为地带来理论建构的障碍。

在对不同国家外交政策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单纯的国内政治解释就像单纯的国际层面解释一样是不充分的,需要“颠倒的第二意象”加以补充。人们越来越明白,融合国内和国际因素比单纯研究其中一个方面能更好地提供关于对外政策的解释。主张世界政治理论的学者希望能够解释国际政治体系和国内结构对国家间互动行为的影响,解释国际力量如何塑造国内政治,解释国内政治的变迁如何改造国际体系的性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世界政治理论学者必须放宽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对国家的三大假定,将体系理论排除掉的国内政治和跨国政治重新找回来,承认国家内部的次国家行为体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体系的变迁也有着重大影响。

首先,世界政治理论放松了国家是一元行为体的假定。世界政治理论学者认为,国内行为体并非绝对按等级排列,几乎所有国家都处在以无政府状态和严格等级状态为两极的光谱的中间地带,即米尔纳所说的多头政治状态。多头政治导致国家内部存在着平行的权力竞争,而这种权力争夺会通过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表现出来。

其次,世界政治理论放宽了国家是自主行为体的假定。国家深嵌于国内社会之中,受国内行为体的制约,国家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决策能力。自由主义

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p. 15.

参见 Andrew Moravcsik, “Introduction: 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xplanations of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in Evans et al.,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pp. 3—42; Harald Muller and Thomas Risse-Kappen, “From the Outside In and From the Inside Ou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Valerie Hudson and David Skidmore, eds., *The Limits of State Autonomy: Societal Groups and Foreign Policy Form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1993), pp. 25—48.

Valerie Hudson and David Skidmore, eds., *The Limits of State Autonomy*.

认为,国家是社会集团的代表,国家的行为和政策是不同社会集团偏好的合成,国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结果。绝大部分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还认为,与安全政策相比,国家在决定对外经济政策时自主性很弱,在这一点上弱国家情况尤甚。

再次,世界政治理论放宽了国家是理性行为体的假定。既然国家的行为不是自主的,那么国家的行为也就未必是理性的。国家的政策可能集中体现强大利益集团的偏好,但个体理性未必带来集体理性,国家对外行为未必符合对整个国家总体利益的理性算计。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防御性现实主义就是考察某个(或某些)强势利益集团挟持国家,致使国家做出非理性对外行为的可能。

修改原有理论假定具有重要意义,海伦·米尔纳曾写道:“放宽某一研究领域的核心假定,将带来新的富有冲击性的理论研究视角。这就正如经济学,由于放宽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供给和需求的假定,从而导致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诞生;放宽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则诞生了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放宽完全市场的假定带来了新贸易理论模型,即战略性贸易理论的诞生。”放宽体系理论关于国家单元的核心假定,那么国家就不再是国际关系中的不变因素,而是一个新的变量,这给世界政治理论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 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的综合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曾呼吁在国际政治领域进行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而这场革命将是从小体系层次的角度来看待国际政治。虽然霍夫曼自己并没有发展出获得承认的体系理论,但展示了其对体系思维方法的强烈信仰,并影响了沃尔兹和基欧汉以及后来的温特,最终实现了这场意义深远的革命,极大增强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如果说体系理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那么,单元层次的回归可能是一场爱因斯坦式的革命,即建立一个单元层次的理论,然后与体系层次的理论融合,建立世界政治的统一大理

Helen V. Milner, "Rationalizing Politics," p. 760.

Stanley Hoffman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Long Road to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 11, No 3, 1959, p. 347.

论。沃尔兹虽然觉得这样做极为困难,但他也承认:“如果有谁能够建构一个同时包容国际和国家两个层次的理论,我们都将为之感到欢欣鼓舞。”

当然,世界政治理论不是对体系理论的摒弃,而是对体系理论的超越。正如沃尔兹一直坚持的那样,无法准确理解体系属性如何影响行为的世界政治理论是糟糕的理论。基欧汉也认为:“宏大的体系理论用途很大,即使有失精确,仍可以作为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所以,如何把体系理论和单元理论整合起来,成为世界政治理论的根本任务。

前面的讨论表明,世界政治理论的建构必须同时借助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的知识成果。世界政治理论要打开国家黑匣子,就必须首先承认国家在功能上是有差异的,因而需要对国家进行分类,而分类的目的是为了从国内层面寻找规律性的影响因素。比如,民主和平论将国家区分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认为国家政治制度差异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关键因素;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家区分为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认为国家的意图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变量;而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将国家区分为强国家与弱国家,认为不同的国内结构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产生不同的影响。要对国家进行精确分类,可能必须对大量国家进行有意义的归类 and 比较分析,而这需要借助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和知识。

与此同时,要想深入理解国内政治结构的变迁,还必须明确国际体系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由外到里的研究线索就是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寻找国内结构变迁的原因,它使传统国际关系学的考察内容渗入到比较政治学,可视为比较政治学向国际关系学的借鉴。

因此,“对社会科学家来说,世界经济的国际化似乎敲响了大学里不合时宜地区分‘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丧钟”。如果不对不同国家内部结构进行比较分析,依然把国家当作相同的单一行为体,将阻碍我们深化对国际体系进程的理解;当然,如果不把需要比较的国家置于相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背景下进行考察,比较也毫无意义。总之,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不能相互借鉴,

罗伯特·基欧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世界政治研究》,载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2页。

参见肯尼思·沃尔兹为《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前言。

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74页。

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第268页。

便不能很好地理解世界政治。

(三) 世界政治理论建构中的困境

如果我们将试图综合单元层次和体系层次的理论称为世界政治理论,那么世界政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会面临四个相互联系的困境。

首先,世界政治理论的描述性色彩过强。描述与分析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是对影响因素做细致无缺的罗列,后者则抓住根本性解释因素。沃尔兹始终认为,一旦放宽国家是一元行为体的假定,我们就只能描述而非解释国际政治。普特南也承认,一个同时说明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太复杂了,因而不能成为真正的理论,因为它是对现实的描述而不是分析。一般而言,描述越完整,解释力就越小。尽管没人否认跨国行为体和国内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但我们仅仅是将一些可能影响结果的变量纳入到考察中,而没有对它们进行仔细取舍和因果关系的排序,研究成果更多地停留在描述层面。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最为关注国际与国内互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越来越趋向于经验描述性研究,缺乏理论上的重大成就。

其次,世界政治理论缺乏一般性。理论所涉及的因果变量越是普遍存在,其解释力就越大,适用范围就越广。一个强理论,应该具备普遍性。世界政治理论的问题在于,国家具有多样性,对其进行准确分类存在巨大难度。当前很多世界政治理论只是对具体问题的解释,往往是通过归纳经验案例建立起来的,而非演绎性理论。因此,这些理论只经受了几个案例的检验,往往只能解释少数的某一类国家,解释范围比较有限。与体系理论相比,单元层次的分析更多停留在对具体问题的经验研究层面,很难建立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如果世界政治理论不具备一般性,那么就只能是国别政治理论。

再次,世界政治理论简约性不高。这一特征与其描述色彩较浓、缺乏一般性的特征不无关联,但理论进步的表现恰恰是用简单的模型解释复杂的事物。

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第268页。

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p. 427.

具体性解释和一般理论解释的区别,可参见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7页。

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pp. 4—5.

比如,米尔纳的国内政治模型就过于复杂。构建世界政治理论过程中存在一个危险,即一旦把视角深入到国家内部,去肢解国家黑匣子时,我们很可能变得茫然和无所适从,因为单元层次的情况过于复杂,即使尽量简化单元层次的变量,也会因为与研究相关的事实过多而陷入混乱。

最后,世界政治理论带来因果关系的混乱。理论是对因果规律的解释及其总结。世界政治理论将单元层次的变量和体系层次的变量重新融为一体,使得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变得模糊起来。现实主义者们批评,由单元层次分析得到的民主和平论“仅仅只是在国内结构与民主国家不发生战争之间发现了一种关联性,而不是建立了因果联系”。他们认为,民主和平论颠倒了因果关系,因为国际体系结构不仅决定单元的对外行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塑造国内政治制度的关键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支持体系理论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对国家对外行为有影响,但国内结构本身却是对国际体系压力做出的反应,因而国内结构充其量只能算是中间变量,而不是原因变量。

正是因为面临上述困境,所以尽管早在三十多年前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就倡导“世界政治范式”,但事实上的理论进步却非常有限。现有文献表明,世界政治理论在单元层次的变量研究上仍然没有建构出有效的理论基础,它们仅仅罗列了一系列影响变量。而且,在解释国际事件时,世界政治理论无法或不愿确定何种因素占主导地位,由此产生的疑问是,“假设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单元或解释同时发生作用,那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分析整合进整体理解中?”此外,与体系理论的国际结构概念相比,单元理论的关键解释性变量、国内结构概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第29页。

Christopher Layne, “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Democratic Peace,” in Michael E. Brown et al,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 320.

比如,有学者认为,英美之所以能发展成为自由民主国家是因为它们都远离战争危险。参见 Brian M. Downing,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Chan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参见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后来,基欧汉也多次使用“世界政治理论”和“世界政治研究”的概念,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世界政治研究》、《世界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及其超越》,载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

Barry Buzan,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Today*, pp. 216—213.

念的含义含混不清，阻碍了类似沃尔兹体系理论那样逻辑严密的单元理论的建立。更为严重的是，“迄今为止没有谁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七、结 语

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突出特点是，研究视角从传统的体系层次转向单元层次，而单元层次的研究又不局限于国家单元，还包括诸多跨国行为体。国内层次和跨国层次的行为体重新回归到国际关系研究之中。不过，单元层次理论的复兴并非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复，而是在吸收体系理论的基础上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再造。

但是，理论的再造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要从国内和跨国层面上找到国家对外行为及国际关系互动的普遍规律，并建构综合体系理论与单元理论的统一理论存在着巨大的可能，也面临着许多的不确定性。不管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必定需要众多学者付出艰苦的努力。

Peter J. Katzenstein et 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 668.
Helen V. Milner, “*Rationalizing Politics*,” p. 766.

作者简介

向钢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1985年获浙江大学工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北京理工大学工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军事威慑、军事决策与博弈分析。

电子邮箱: xianggh_03@em.tsinghua.edu.cn

王永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1966年在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获工业企业电气化学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决策理论与管理决策优化。著有:《国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与战略》(2000年)、《运筹学》(1993年)。

电子邮箱: wangyx@em.tsinghua.edu.cn

王莉欢 1986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社会科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现在新加坡政府任职。

电子邮件: laifoonwong@pacific.net.sg

阎梁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5级博士研究生。1995和2001年分别在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2—2005年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任助理研究员。著有:《社会危机事件处理的理论与实践》(2003年)。

电子信箱: yanliang05@mails.tsinghua.edu.cn

潘成鑫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院讲师。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4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96—1997年为墨尔本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研究兴趣为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东亚安全。论文曾发表在 *Alternatives, Political Science* 等学术刊物上。专著 *Underst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an Emerging Superpower*, 将由英国 Edward Elgar Publishers 出版。

电子信箱: chengxin.pan@deakin.edu.au

李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2003年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

电子信箱: kindyleeway@gmail.com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87、1990和1996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政治、中美经贸关系。著有:《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年至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1998年)、《知识经济对策:运作与案例》(1998年)。

电子信箱: yowang@pku.edu.cn